



中国共产党史稿

柳建辉 主编

第③卷

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

[1927.8—1937.7]

唐正芒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史稿

柳建辉 主编

第3卷

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史稿·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1927.8～
1937.7 /柳建辉主编；唐正芒著。—成都：四川人民
出版社，2011.6

ISBN 978-7-220-08356-3

I. ①中… II. ①柳… ②唐… III. ①中国共产
党—党史—史料—1927～1937 IV. ①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7130 号

ZHONGGUO GONGCHANDANG SHIGAO

中国共产党史稿（第3卷）

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 [1927.8—1937.7]

柳建辉 主编

唐正芒 著

策 划	解 伟
责任编辑	周 颖 邓 燕
装帧设计	杨 潮
责任校对	袁晓红
责任印制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5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6.5
插 页	3
字 数	410 千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8356-3
定 价	580.00 元 (全套共 12 卷)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目 录

第一章 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局	(1)
第一节 白色恐怖笼罩中国 革命形势转入低潮.....	(1)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建立及其内政外交.....	(7)
第二章 各地武装起义的爆发	(26)
第一节 南昌起义与八七会议.....	(26)
第二节 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	(38)
第三节 广州起义和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	(44)
第四节 中共六大——莫斯科郊外的中共盛会.....	(64)
第三章 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73)
第一节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海陆丰革命根据地.....	(73)
第二节 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78)
第三节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87)
第四节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93)
第五节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98)
第四章 土地革命的开展	(105)
第一节 井冈山、海陆丰根据地的土地革命.....	(105)
第二节 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形成.....	(109)
第三节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111)
第四节 “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	(114)

第五章 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	(117)
第一节 古田会议与党和红军建设纲领的制定.....	(117)
第二节 粉碎国民党的第一、二、三次军事“围剿”	(123)
第三节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	(131)
第四节 为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而斗争.....	(137)
第五节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55)
第六章 “左”倾错误的危害与革命的曲折	(161)
第一节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出现.....	(161)
第二节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	(169)
第三节 严酷的白区斗争.....	(182)
第七章 九一八事变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	(208)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208)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号召.....	(218)
第三节 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220)
第四节 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与白山黑水间的苦战.....	(225)
第五节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斗争和失败.....	(237)
第八章 实现历史性的转折	(242)
第一节 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和红军反“围剿”的失败.....	(242)
第二节 长征的开始和中国革命的危急局面.....	(249)
第三节 遵义会议的召开与党的第一次历史性转变的实现.....	(259)
第四节 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271)
第九章 万里长征的艰难胜利	(276)
第一节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	(276)
第二节 同张国焘的南下错误路线斗争和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	(289)
.....	(289)
第三节 红二、六军团的长征及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	(303)
第四节 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师与长征的胜利.....	(308)
第十章 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316)
第一节 危急的华北.....	(316)
第二节 《八一宣言》的产生及其影响.....	(325)

第三节	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	(331)
第四节	全国抗日怒潮的再次高涨.....	(341)
第十一章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356)
第一节	瓦窑堡会议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356)
第二节	党在白区工作方针的转变与党的逼蒋抗日方针.....	(360)
第三节	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	(367)
第四节	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和西征.....	(374)
第五节	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	(385)
第十二章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395)
第一节	中共争取张学良、杨虎城联合抗日.....	(395)
第二节	西北统一战线局面的形成.....	(401)
第三节	由“哭谏”走向“兵谏”	(403)
第四节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国内和平的实现.....	(407)
第五节	为早日实现全民族抗战而斗争.....	(414)

第一章

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政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入了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但革命并未马上进入高潮。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屠杀工农，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了大半个中国，革命形势处于暂时的低潮。然而，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反动的内政外交，对内实行反共反人民政策，对广大人民继续实行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对外投靠帝国主义，使得引起中国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中国革命很快重新兴起。

第一节 白色恐怖笼罩中国 革命形势转入低潮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局面

1927年4月19日，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二天，就发布了一份此前由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过的明令通缉包括共产党领导人、工人运动领袖、国民党左派以及其他著名活动家197人在内的“黑名单”，作为“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的“秘字第一号命令”，其中包括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等人。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举行会议，通过清党原则六条，任命邓泽如、吴倚伦、曾养甫、萧佛成、段锡朋、冷欣、郑异组成“中央清党委员会”。7日，“中央清党委员会”正式成立，以邓泽如为主席委员，统一主持全国清党事宜。10日由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20日

“中央清党委员会”颁布《清党条例》，要求“将共产分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反动投机、腐化恶劣等分子清除之”，“通令全国各行政机关一体查照办理”；并先后指派各省、市“清党”委员，组织各省、市“清党委员会”。于是，南京政府的“清党”运动，遍及各省。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等城市以及广东、广西、安徽等省，对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工农群众进行屠杀。昨天的同盟者今天被看成仇敌，一时白色恐怖笼罩了大半个中国。

武汉汪精卫集团“分共”后，其军队到处逮捕共产党人，加紧镇压工农运动。7月27日，他们发表《国民党中央告共产党书》，要共产党“放弃其近日对于本党敌视的态度，否则本党为革命利益计，不能不执行相当纪律”。南昌起义发动后，汪精卫对共产党恨得咬牙切齿，“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付共产党，“捉一个杀一个”，“把他们一个个抓来枪毙”^①。

在8月8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由汪精卫提议通过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关于“清党”的决议：通缉南昌起义领导人；凡共产党员跨有国民党党籍并任职者，一律开除党籍并免职。又通过了《清查共产党办法》四条，规定：（1）国民党党员和机关职员重新登记稽核决定去留；（2）监管著名的共产党分子；“如有反革命行为者，应即拿办”；（3）有共产党嫌疑者，限于3日内登报声明或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4）如有共产党员潜伏各级党部、机关，既不退出又不声明脱离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处。从此，武汉政府的反动分子更加疯狂地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比之蒋介石集团的“清党”有过之而无不及。革命中心武汉及其他地方，继上海、南京、广州之后，也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宁汉合流、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确立以后，国民党变本加厉地实行对共产党的屠杀政策和为自己的恐怖统治制造法律依据。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制止共党阴谋案》，规定“凡经审察确为属于共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者，均应积极铲除，或预为防范”。3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刑法》，规定“意图颠覆政府僭窃土地或紊乱国宪”而实行暴动者，要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月，又颁布所谓《暂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23次扩大会议速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行反革命治罪法》，露骨地规定，凡“意图颠覆中国国民党”“或破坏三民主义”的各种行为，都以“反革命罪”论处。

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著名活动家，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先后英勇牺牲。国民党政府剥夺了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工会领袖及积极分子或被杀害，或被逮捕、开除；对农民实行反攻倒算，残酷压榨和掠夺。

为了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国民党打着“三民主义”旗号，也进行一系列政治欺骗活动，如拉拢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作为政治上“民主”的装饰品，颁布《工厂法》、《土地法》等法令以欺骗广大群众。不过，蒋介石更重视的是建立起完善的特务体系，使党务和特务相互结合和利用；他利用庞大的特务系统严密控制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部，对全国人民进行恐怖统治。

国民党的特务体系是从其中央党部产生演化出来的。1928年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由陈果夫代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党务调查科，陈立夫任主任，专门从事情报工作。从1928年到1930年，党务调查科大肆侦查所谓“反动分子”，破坏中共组织，据其统计，共捕获中共高级干部19人、中级干部80人，一般干部及普通党员1.5万人。1932年，党务调查科内又秘密成立“特工总部”，以徐恩曾为主任，直属二陈。以CC为核心的党务调查系统，主要是控制党政机关和文教单位。1935年，国民党中央机关扩编，党务调查科升级为党务调查处，进一步扩大了特务活动的范围，成为“中统”的前身。

蒋介石的另一个特务系统是“中华民族复兴社”。1932年3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又上台后，指令黄埔系中从事政训工作的亲信，如邓文仪、贺衷寒、康泽、酆悌、潘佑强、郑介民、胡宗南、桂永清、梁桥、萧赞育等人，组织了“复兴社”，奉蒋介石为“当然社长”。“复兴社”具有明显的法西斯性质。在全国各地均设有调查室、工作站、别动队以及各种外围组织，仿效希特勒的“铁血”手段，进行侦查、跟踪、拘捕、绑架、审讯、暗杀

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活动，消灭异己，破坏革命。康泽的别动队在江西配合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围剿”红军，戴笠的特务则主要在城市中捕杀革命者。他们在全国进行血腥的恐怖统治。

蒋介石独裁政权为了强化其法西斯统治，还在乡村采取了两项严密措施，一是建立和加强反革命地主武装保安团，二是推行保甲制度。

国民党政府规定每省划作若干区，每区至少要训练出一个保安团（民团）。到1934年夏，仅就8个省的统计，保安团就扩充到1700万人，形成一支庞大的地主武装。1933年6月，国民党政府又采用封建统治的保甲制度，保甲编制以十户为一甲，设甲长，以十甲为一保，设保长。开始是在接近革命根据地的地区建立保甲组织，后来普遍推广到全国各地。

此外，国民党政府还制定一系列条例法案，加强对人民的统治。1927年12月淞沪卫戍司令部下令，严禁罢工运动，违者军法从事。1928年1月1日，武汉的国民党政府解散工、农、妇、学等群众团体。8日，浙江的国民党政府下令严禁群众运动，取缔抗租罢工。17日，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下令一律取消现存工会。6月，国民党政府公布《劳资争议处理办法》，规定，未经调解仲裁“不准罢工或闭厂”。8月8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政府与民众之关系及其职权案》，规定“绝对禁止示威游行、群众大会，与政治罢工”。1931年1月，国民党政府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根据它的规定，凡从事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活动者要处死刑，凡与革命活动发生联系或以文字图画演说进行革命宣传者，也要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凡接受上述文字图画演说的宣传并转告他人者，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组织进步文化团体，或集会或宣传民主思想者，也处以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等。凡此种种命令法案，把革命人民争得的民主权利剥夺殆尽。

二、中国革命转入暂时的低潮

在这种白色恐怖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领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党外革命人士英勇悲壮地倒在血泊之中，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在非常险恶的局势下，党的队伍中也有一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陷入混乱状态，党内

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消极情绪。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悲观，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有的人甚至公开向敌人忏悔，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成了可耻的叛徒。据 1927 年 11 月的统计，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 6 万人急剧减少到 1 万多人。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吓倒。他们冲破敌人反革命的高压，在黑暗中仍然高举着光辉的革命旗帜，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夏明翰在就义前的绝命诗中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周文雍在狱中写道：“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郭亮在牺牲前夕写给妻子的遗言是：“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江西弋横起义第六路指挥邱金辉在临难时，敌人极其残忍地在他的左右肩胛用刀挖洞插上蜡烛，头顶插香点燃，并用火烧其心窝，他仍毫不畏惧，忍痛高呼“杀死我一个，杀不绝共产党人，革命一定要胜利”，最后壮烈牺牲。这种为革命英勇牺牲的感天动地的事迹数不胜数，烈士们的英名连同他们的业绩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

在敌人制造严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更多真正的革命者仍然坚持斗争。一些追求进步的革命志士，正是在革命的危难时刻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来。如毛泽东的老师、老教育家徐特立，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贺龙、叶剑英、彭德怀以及革命优秀青年廖承志等，都是在这时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镇压，各地革命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等组织被查禁。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 280 余万人减至几万人。从 1927 年 7 月到 1928 年 6 月，党虽然发动和领导了有 34 万余工人参加的 47 次罢工斗争，但只有少数几次取得胜利，绝大多数归于失败，拥有近 1000 万会员的各地农民协会大多被解散。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河南、陕西、四川等省的许多县区，虽先后爆发多次农民武装起义，但此起彼落，多数以失败而告结束。

总之，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革命势力已经大大超过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已经

过去，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形势低潮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其一，革命阵线缩小了。原来四个阶级联盟的国民党变成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革命军成了屠杀人民镇压革命的工具。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反革命。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三个，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也发生了很大动摇。

其二，革命的主观力量遭到极大摧残。革命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大批的共产党员被屠杀，一些不坚定的分子离开了党，少数甚至当了叛徒。几个月内，共产党员的数量锐减，大多数地方组织被打散。党领导的工会大都解体，能直接领导的工会会员仅几万人；曾拥有近千万会员的农会组织，绝大部分不再存在。

其三，工农运动由进攻转入防御，由轰轰烈烈转为冷冷清清。工人群众虽然坚持着斗争，但这时的斗争明显地表现出低潮的特征。斗争次数大大减少了，参加者中，店员和手工业工人占了很大比重，产业工人斗争很少爆发；工人斗争多以经济斗争为主，起因大都是为了改善工资待遇；即使开始了斗争，也是多数遭到镇压或毫无结果。在农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形势已经过去，斗争呈现着时起时伏的状况，发展极不平衡。国民革命时期农民运动掀起过高潮的地区，如湘、鄂、赣、粤等省，虽然很快出现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武装割据，但在全国反革命统治当中，这只不过是星星之火；其他地区也有一些农民斗争的发生，如江浙一带有若干起农民抗租抗税斗争，河南继续有红枪会的斗争，河北、山东局部地区也有过某些农民的反抗斗争，但都不具有动摇反动统治的意义。农民斗争的总的形势，也是转入低潮。

当时的形势正如毛泽东 1928 年 11 月所说的：“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7—78 页。

革命潮流是低落了，但是引起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国民党政权与北洋军阀统治在阶级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所以，中国仍然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新的革命高潮必然会再次出现。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建立及其内政外交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国民党不再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旗帜，也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革命政党，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也只不过是以新军阀的统治代替了旧军阀的统治。

一、国民党政权在全国的建立

国民革命失败时，国民党集团内部仍派系林立，国内政局混乱不堪。当时存在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和南京中央党部，称为“宁方”；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和武汉中央党部，称为“汉方”；还有西山会议派控制的上海中央党部，称为“沪方”。在北方则有奉系军阀张作霖组织的北洋军阀末代政权安国军政府。由此国内出现了三个政府、三个党部的局面。此外还有阎锡山、冯玉祥等各自为政的地方军阀。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一方面在反共的基础上开始合流，另一方面又为争夺“统一”的中央政权明争暗斗，甚至兵戎相见。

1927年8月，蒋介石受到桂系排挤，被迫下野，但他以退为进，仍控制着江苏、浙江一带的实权。蒋介石的下野促成了“宁汉合流”。9月15日，宁、汉、沪三方代表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并以其为最高领导机关，宣告国民党的“统一”。特委会的成立就等于取消了武汉国民党中央，汪精卫的拥护者唐生智认为特委会的成立无异于篡党。21日，唐生智成立武汉政治分会，统辖鄂湘皖三省与南京对峙。10月20日，南京政府下

令讨伐唐生智，兵分三路西征。11月11日，唐生智通电下野，武汉失败。但接着而起的又有广东军阀李济深、张发奎，打出“拥汪护党”的旗号，与南京对峙。汪精卫、李济深在广州公开树起国民党中央的旗号。不久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先联汪制桂，继而又联桂制汪。蒋介石于1928年2月操纵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南京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控制了国民党中央的党政军大权。3月，蒋介石又将国民党的军队编为四个集团军，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同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北伐”，沿途消灭了孙传芳残部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5月1日蒋介石率领的第一集团军攻占济南。5月3日，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公然出兵攻占济南。血腥屠杀中国军民，中国军民死伤达数千人，是为“济南惨案”。蒋介石竟然妥协退让，下令中国军队退出济南，绕道北上，逼近天津，奉军被迫退至关外。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6月3日放弃北京，逃往东北。次日凌晨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车站，是为“皇姑屯事件”。6月8日，国民党军队进占北京。15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北伐胜利”、“统一告成”。6月20日，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就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控制东北局势。此后表示愿意停止内战，南京政府也采取了“和平统一”东北的方针。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30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在此之前，西南各省军阀先后通电拥蒋，新疆、热河也宣布易帜。由此，南京国民政府取得了全国政权形式上的统一。然而，这种统一只是暂时的表面的，新编的四个集团军以及新归附于南京的奉系军阀，仍然是国民党的几个不同的大的派系。一些地方的军阀，表面上归附于南京，实际上也还依然保持着他们各自的势力。所以，中国各派系军阀之间的争夺混战并没有从此终止。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军阀混战仍然连年不断，有的规模甚至超过了北洋军阀时代。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既然是以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那么作为半殖民地中国特征之一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也必然伴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建立而不断发生。蒋介石政权建立和“统一”的过程，也就是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过程。自“东北易帜”、蒋介石政权实现表面上的“统

一”后，新军阀的混战大体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9年1月到1930年3月。

国民党实现表面上的统一后，由于各个派别都想通过政治斗争来达到各自扩大地盘和保存实力的目的，不久即又陷入了新的分赃斗争。1928年6月阎锡山占领北平后，蒋、冯、阎、桂在北平集会，商讨裁兵编遣问题。蒋介石为了独揽兵权，拉拢冯、阎到中央政府做官。冯、阎等明知蒋之阴谋，但名义上也只好表示拥护。192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编遣会议，表面上是为裁减全国兵额，实际上却是企图削弱别人，壮大自己。这无异于挖掉各派军阀的命根子，因此所谓裁兵问题就成为爆发新军阀混战的主要原因。

蒋介石不仅要统一军权，还要统一政权，迫使其他军阀失去立足之地。当蒋联合各派军阀对奉系作战时，为了稳定自己阵脚，曾经实行过地方分权，委任了几个政治分会主席。但反奉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就独揽中央大权，在编遣裁兵的同时，他要求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在1928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唆使其党羽提出取消政治分会的议案，议决年底取消。经各派反对，蒋介石又在中常会提出延期到1929年3月15日前取消。这个问题也成为各派军阀反蒋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1929年3月，蒋介石为了统一党权，又一手包办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多数地区的代表都由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中央圈定或亲自指定。这次大会冯、阎拒不参加，各地纷起反对；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桂系的汉口市党部通电反对，河南省党部提出抗议。但蒋介石置若罔闻。通过三全大会，蒋介石改组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他的亲信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全部控制了国民党的中央，成了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

蒋介石吞并异己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各派军阀的强烈不满。于是3月以后，就爆发了各派军阀的反蒋战争。

1929年3月，蒋介石与桂系为了争夺两湖的地盘爆发了蒋桂战争。武汉政治分会是李宗仁的大本营，名义上服从南京政府，实际上无论财政、军事都自成系统，不听南京约束。1929年2月，武汉政治分会撤免了亲蒋的鲁涤平湖南省主席职务，改组湖南省政府，任命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以中央名义，下令查办，并调军西进，战争由此开端。4月初，桂系

失败，蒋军控制了两湖大部分地区。5月以后，蒋介石又由湖南、广东两省追击桂系。6月底，陈济棠的粤军进占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被迫暂逃国外。

紧接蒋桂战争之后又爆发了蒋冯战争。蒋桂战争时蒋介石采取“稳冯打李”的方针，以免冯、桂联合对他进行南北夹击。蒋介石一方面以地盘和职位来拉拢冯玉祥，另一方面又以重金收买冯的部下，挖冯的墙脚。待桂系问题解决后，5月底蒋即下令讨冯，由于冯部有被蒋收买的，冯被迫通电下野。7月，第二次编遣会议后，各派军阀对蒋更加不满。10月10日，西北军将领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等27人通电反蒋，推举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分三路出兵东进。蒋介石调大军应战。他恐冯、阎联合，采取“拉阎打冯”的方针，委任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每月向阎拨款680万元。至11月初，西北军战争失利，退回陕西，战事暂时停止。

1929年12月初，郑州的唐生智和安徽的石友三与改组派取得联系，举兵拥汪反蒋。蒋介石调军北上攻唐。这时阎锡山、韩复榘已被蒋收买，加入攻唐。1930年1月，唐生智败退，石友三重新投蒋，战事遂告结束。

总的看来，这一阶段的战争因各派不能真正联合对蒋作战，被蒋各个击破。但各派地方军阀并不真正甘心失败，蒋介石只能取胜一时，而无法将他们彻底消灭，一旦恢复元气，就又卷土重来，继续同蒋作对。这就有了第二阶段的军阀混战。

第二阶段：1930年4月的“中原大战”及地方军阀之间的混战。

这一阶段的新军阀混战带有决战的性质。从政治上看，一方是各军阀形成反蒋大联合，另一方是美、英帝国主义与买办资产阶级对蒋介石的极力支持；从军事上看，全国主要新军阀几乎都参加了这次战争，双方倾注全力，旗鼓相当，动员军队共达100万以上（蒋军50万，反蒋军60万），这是中国近代军阀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恶战。

由于蒋介石吞并异己不择手段，各派军阀都不愿投靠他，而又岌岌自危，唯恐落入他的圈套，于是就互相串联，形成了反蒋的大联合。同时，受到蒋介石排斥的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各政派，也乘机加入这个大联合，以便利用各派军阀的实力，作为自己反蒋的后盾。因此，这些同床异梦的军阀政客就在反蒋的共同目标下结合起来了。

1930年3月中旬，冯、阎、桂三派的将领鹿钟麒、商震、黄绍竑等50余人，共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共起讨蒋。这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和以谢持、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以反对蒋介石的三全大会为名，也与冯、阎联合反蒋。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开始。战线绵延数千里，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北至山西，战火燃遍了整个中原。战争开始时，蒋军失利。

7月间，各派反蒋政客集中北平，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扩大会议。9月初，在北平另立“国民政府”，推阎锡山为主席，并成立约法委员会，起草所谓中华民国约法，与南京对抗。而此时拥兵关外的张学良则采取“中立”观望的态度。在关键时刻蒋介石加紧了对张学良的拉拢收买。

为了拉拢张学良，蒋介石先把青岛地盘让给张学良接防，又给张学良以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名义，并贿以3000万元的巨款。8月底，津浦线战事中蒋军渐见优势。9月18日，张学良遂发出拥蒋通电，并派军入关，占领平津，使双方形势起了急剧变化。11月初，阎、冯失败，攻入湖南的桂军亦退回广西，战争又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结束。这次大战，从4月打到10月，历时半年多，双方死伤30万人，支出军费5亿元，受战争影响的省达20个以上，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数计的损失。

中原大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蒋介石真正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各派军阀仍然保持半独立状态，继续与南京政府发生公开对抗以至战争，各派政客也继续与蒋介石对立，纷争不已。如1931年春又爆发了蒋桂战争，同年5月，汪精卫、胡汉民、孙科派和西山会议派在广州召开了反蒋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并成立了所谓“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抗衡。此外，还有各省区军阀之间的不断混战，如四川的刘湘和刘文辉的战争，云南的唐继尧与龙云的战争，贵州的王家烈和犹国才的战争，山东的韩复榘与刘珍年的战争，等等。事实证明，对内屠杀人民、诛除异己，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新军阀，虽然建立了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但却无法稳定其统治，更谈不上真正实现全国的统一。

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政外交

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后，其对内政策是实行残酷的独